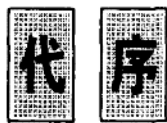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志编纂委员会 编

杨兴 主编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志

三秦出版社



历史的脚步

——从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杨 兴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整整 50 周年了。历史已经跨越了半个世纪。从在毛泽东同志亲切关怀下建立和《讲话》精神指引下成长起来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已经历了漫长而短促的 54 个冬天和春天。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围绕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为”，即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有她艰苦创业的日日夜夜，有她的鼎盛年代，也有饱经风雨、举步维艰的岁月，又有奋力拼搏图振兴的新时期。几十年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坚持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前进，戏剧创作就繁荣，事业就发展；什么时候脱离了人民群众，偏离了《讲话》指引的方向和道路，戏剧创作就会走弯路或斜路。历史的脚步就是这样。

(一)

1938 年 4 月间，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晚会上，毛泽东同志看了业余剧团演出的秦腔传统节目《五家坡》、《二进宫》和京剧《升官图》等戏后，对工会负责人毛齐华说：“你们看群众非常欢

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当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的内容。”又转身问坐在他身后的边区文协负责人柯仲平同志：“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同志当即表态“应该应该”。此后，就把延安师范的“乡土剧团”和延安市工人业余剧团合并，于7月4日正式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由柯仲平担任团长，马健翎、张季纯任剧务主任。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一个“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一个“应该有新的革命的内容”，一下子把秦腔等地方戏曲艺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与革命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民众剧团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建团开始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你从哪达来？我从老百姓中来；你又要到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这是柯仲平同志为剧团写的团歌，也就是民众剧团建团的指导思想。他们在没经费、没服装、没幕布、没气灯，每人只能睡一尺宽的地方，甚至有时连肚子也吃不饱，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东凑西借，节衣缩食，艰苦创业；他们运用秦腔、眉户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艺术形式，积极创作和演出革命现代戏；他们踏着茫茫冰雪，顶着呼啸的寒风，走延长，上三边，满腔热情，给群众送戏上门，传播革命道理，宣传党的政策，唤起民众，动员抗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更加坚定了为人民大众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方向和决心，像颗颗种子，撒遍边区各地。使戏曲艺术之花，根植于黄土深层、人民大众的心底。

在革命战争年代，民众剧团之所以能够走在时代的前锋，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和爱戴，最根本的就在于她有一支与时代和人民大众保持血肉联系，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精神的创作队伍，能够不断创作出受群众欢迎的戏曲剧本。马健翎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杰出代表。他在毛泽东思想和《讲话》精神的培育下，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深厚的群众生活基础和非凡的艺术才能，连续创作出许多优秀剧目：有歌颂抗日民族英雄，宣扬民族气节的秦腔戏《好男儿》、《查路条》等；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罪行的秦腔戏《血泪仇》、《一家人》、《穷人恨》；也有反映边区军民生产自救的眉户戏《十二把镰刀》、《大家喜欢》等。而且他在创作中，认真把握人民大众的审美情趣，使自己的作品“近情近理，红火热闹，教人看得懂，受感动；看完了，明白世事，懂得道理”。因而他的许多作品，成为当时各革命根据地以及后来全国各地的流行剧目，盛演不衰。

(二)

西安解放后，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进入西安，改为西北民众剧团，以后又扩建成西北戏曲研究院。1955年，与陕西省秦腔实验剧团、陕西省眉户剧团（前身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关中八一剧团）等合并，组建为陕西省戏曲剧院。从农村到大城市，由剧团扩大为剧院，队伍不断壮大，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改善。环境变了，形势变了，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传统不能变。剧院在马健翎、黄俊耀等一批老艺术家的领导下，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和道路继续前进。

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他们不因为剧院设在大城市就停留在大城市的房子里，而是遵照《讲话》的精神，继续深入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和新的群众时代相结合。他们在农村建立了生活基地，长期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了解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熟悉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学习人民群众的生活语言，积极进行现代戏的创作。被称为现代戏中一颗明珠的眉户戏《梁秋燕》，就是黄俊耀同志长期深入农村生活，亲自参加婚姻问题的调查研究，经过几年的艰辛创作和反复修改排练出来的。演出后深受广大群众喜爱，流传甚广，盛演不衰。剧院以后陆续创作的《粮食》、《两颗铃》、《雷锋》等现代戏，都受到群众的欢迎与喜爱。

(三)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剧院在抓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的同时，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积极进行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和历史题材剧目的创作。例如对《游西湖》、《赵氏孤儿》、《窦娥冤》、《金碗钗》、《白玉琪》、《烈火扬州》、《法门寺》、《无底洞》等剧目，有的去芜存精，推陈出新，加强了剧本的文学性；有的结合剧本的改编，对表导演、音乐唱腔、舞台美术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有的对武戏的表演技巧作了很好的运用和发展。这为不断适应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积极提高传统戏的质量，加强秦腔艺术的改革，起

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还应该特别提及的是,1956年,剧院还把碗碗腔从皮影戏搬上大舞台,不仅继承发展了这一剧种,扩大了观众面,而且对以后的弦板、阿宫、线戏等剧种,从皮影、木偶搬上大舞台,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1958年和1959年,剧院原二、三团参加“陕西省戏剧赴京汇报演出团”,随带秦腔《游西湖》、《赵氏孤儿》,碗碗腔《金碗钗》、《白玉琪》,眉户戏《梁秋燕》等,先后两次晋京汇报演出,轰动京华。受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彭真、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文艺界、戏剧界领导专家的极大好评,有“老树红花”之誉。接着江南13省市的巡回演出,扩大了秦腔、眉户、碗碗腔剧种的观众面,名扬半壁河山。

此后的十年“文革”,许多老同志、老艺术家和名演员,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而挨整,整个剧院也由此元气大伤,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1980年,戏曲剧院改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多方面的需求,促使秦腔艺术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1983年,省委、省政府提出“振兴秦腔、振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号召,加强了研究院的领导,要求“一年起步,两年出现新气象,三年见成效”。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振兴秦腔、振兴戏曲研究院,最终目的是要出人出戏,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在三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精神鼓舞下,研究院很快医治好身上的创伤,冲破戏曲停滞的态势,以改革为动力,把全院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艺术建设和队伍建设的轨道。强调继承发扬延安革命文艺传统和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深入生活的创作道路,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种种干扰,从抓剧目、出人才和艺术出新做起,以赢得老观众,吸引新观众,使秦腔在振兴中提高,在改革中发展。

在抓剧目、出好戏上,强调发挥陕西地方题材优势,坚持新创作现代戏、新编历史戏和改编传统戏“三并举”,适应时代大潮,努力繁荣创作。对历史题材,侧重于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曾在陕西建都的优势,选择有意义的人物和事迹进行创作。对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则根据不同情况,或保

骨架，破俗套，或守主干，赋新意，推陈出新。对现代戏的创作，则立足于同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积极反映现实生活，紧扣时代脉搏。在艺术建设上，强调进行新的探索和改革，以质取胜，提出“以我为主，扬长补短，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指导思想。这个“我”是秦腔，是眉户，是华剧；要扬“我”之长，补“我”之短；博采其他姊妹艺术之长，也是为了丰富“我”，不是模仿，不是照搬，更不是代替，而是要“融合”进来，为“我”所用。在队伍建设上，强调重视人才，才尽其用，鼓励竞争，不断培养和推出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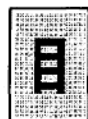
从上述几点出发，首先把新编秦腔古代戏《千古一帝》，作为“两个振兴”的起步戏，从剧本选材、立意和导演的构思，以及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都站在现实的高度，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秦王嬴政统一中华的历史功绩，体现时代风貌，塑造和展现秦王那种“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的英气勃勃、叱咤风云的形象，引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时代开拓感，因而博得了“古朴宏伟，气势磅礴，给人以开拓前进、奋发向上的力量”的艺术效果。新编华剧《杨贵妃》，则以时代的创新意识，融戏、乐、舞于一台；并且一反对杨玉环其人其事传统观念，还其悲剧命运的本来面貌。以“诗情绵邈”和悲凉的舞台艺术气氛，引发人们对在“马嵬兵变”中，作了封建君王替罪羊的杨玉环的同情，让人们在历史的反思中得到启示。与此同时，积极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坚持年年抓现代戏，年年演现代戏。先后创作排演了及时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面貌的许多新剧目，有以反映关中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题材的《杏花村》，有以反映农村发展商品经济为题材的《酒醉杏花村》，有反映陕南山区发展乡镇企业中两种思想观念的《九岩风》，有反映农村群众随着时代变革在婚姻爱情问题上的新观念的《漂来的媳妇》，以及一些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风尚和鞭挞丑恶现象、加强法制观念的现代戏曲小戏，还有描写杨虎城将军早期革命活动的《二虎守长安》等。继承发扬了延安革命文艺传统，守卫了陕西地区戏曲现代戏这块阵地。在传统戏的整理改编方面，根据不同剧目的不同题材和内容，删枝剪蔓，突出主题，在艺术上大胆改革出新，使情与技有机结合，以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整体艺术美，先后整理改编了《鬼怨·杀生》、《悟空借扇》、《盗仙草》、《戏妖》等折子戏和《西湖遗恨》等本戏，演出后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与喜爱，特别是争取了一批青年观众。

振兴秦腔和振兴研究院的工作，起步于改革开放和戏曲不景气的年代，全

院同志迎难而上，奋力拼搏。从1985年开始到1992年，先后有秦腔团、华剧团、眉户团和青年实验团分别演出的《千古一帝》、《杨贵妃》、《酒醉杏花村》、《二虎守长安》、《西湖遗恨》等本戏及《鬼怨·杀生》、《悟空借扇》、《盗仙草》、《戏妖》等折子戏共12台节目，连续九次奉调晋京，参加全国会演、中国艺术节、中国戏剧节、亚洲传统戏剧国际研讨会、亚运会艺术节和汇报演出，使秦腔、华剧（碗碗腔）、眉户重新登上首都舞台，受到了奖励，得到了“人新、戏新、面貌新”和“出人、出戏、走正路”的赞誉。华剧团演出的《杨贵妃》、《金碗钗》和青年实验团演出的《西湖遗恨》、《屠夫状元》、《鬼怨·杀生》、《悟空借扇》、《盗仙草》、《拾黄金》、《杀狗劝妻》、《放饭》、《隔门贤》等共六台节目，两次参加了香港举办的“中国地方戏曲展”。秦腔团的《千古一帝》，又应邀赴日本演出；青年实验团的《西湖遗恨》和折子戏《盗仙草》、《悟空借扇》、《双下山》、《三岔口》等又应邀赴北欧的芬兰参加艺术节。这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戏曲艺术团体，不仅在黄土地上扎了根，而且走向海内外，在自身发展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 一、本志以系统记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发展历史及理论研究成果，繁荣社会主义戏曲事业，促进文化交流为宗旨。
-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 三、本志上限 1938 年，下限至 1992 年。
- 四、本志分图表、志略、传记三大部类，并以此顺序排列。
本志以代序代作综述部类。
图表包括大事年表、演出路线示意图及有关图表。志略分剧种、剧目、音乐、表演、舞台美术、机构、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报刊专著、轶闻传说、谚语口诀等。
立传人物按其生卒年月排列。在世人物不立传，他们的活动在有关部类记载。
- 五、本志附录包括参加全国及省调演汇演各项获奖名单、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及有关内容。
- 六、本志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公元为先，夹注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记年。



大事记	(3—68)
-----------	--------

附：演出路线示意图

志略

一、剧种	(71)
二、剧目	(82)
三、音乐	(126)
四、表演	(224)
五、舞台美术	(258)
六、组织机构	(272)
七、演出场所	(281)
八、演出习俗	(283)
九、报刊专著	(286)
十、轶闻传说	(293)
十一、谚语口诀	(301)

传记	(307—338)
----------	-----------

附录

一、参加全国及省调演汇演各项获奖名单	(341)
二、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	(364)
三、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团歌	柯仲平 (368)

四、三大秦班下江南	黄 河 (369)
五、磅礴、质朴、清新、缜密	
——试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艺术风格	
..... 王志直 晨 歌	(370)
后记	(377)

大事记

(1938~1992)

1938年（中华民国27年）

4月，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戏曲晚会上，看演出秦腔《五家坡》和京剧《升官图》等戏时，当场对工会负责人毛齐华说：“你们看，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当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的内容。”齐华指着坐在毛主席身后的柯仲平说：“这是文协的老柯，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毛主席转身问柯仲平：“是不是应该搞呀？”柯仲平回答：“应该，应该。”第二天，柯仲平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始筹建剧团的工作。

7月4日，“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延安师范学校的“乡土剧团”和延安市“工人业余剧团”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充实而正式宣告成立，归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领导。柯仲平任团长，刘克礼任副团长，张季纯、马健翎任剧务部主任，墨遗萍任教务部主任，李丽莲任音乐教员，刘白羽、杨超、柳青、草明、董速等先后任文化教员。演职人员有贺原野（贺风）、张云、史雷、毕雨、党奎、李刚、王志义、姚伶等20余人。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当日，在延安火神庙戏台举行公演，演出了马健翎创作的秦腔现代戏《一条路》，张季纯创作的秦腔现代戏《回关东》。

8月，正式制订并印发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简章》，详细地写明了：定名、宗旨、组织、职权、会期、团员、经费、教育、地址、附则共十条。确定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的目的、任务及活动形式是：“采取旧形式新内容之手法，改进各项民众艺术，以发扬抗战力量，提倡正常娱乐。”

9、10月，由马健翎创作与导演，新排出了秦腔现代戏《好男儿》、《那台刘》、《查路条》（又名《五里坡》）。

1939年（中华民国28年）

1月，柯仲平在延安刘坪店村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写出了团歌：“你从哪来？从老百姓中来。你又要往哪去？到老百姓中去……”由杜矢甲谱曲。民众剧团的同志走到哪里唱到哪里。

2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第一次出发巡回演出，由延安到东川口、窑店子、延长、延川、安定（子长）、张家畔、定边、盐池，又返回张家畔前往保安（志丹）、高桥镇等地，共经过30余处，行程约2500余里，于1939年6月初返回延安。被誉为“小长征”。

6月初,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小长征”结束,回到延安,受到党中央、陕甘宁边区以及延安市党政领导的更大关怀,让剧团住在党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隔壁。并把剧团归属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也有了正式预算。李富春代表党中央接见了柯仲平及剧团部分人员,他握着柯仲平的手称赞说:“白手起家,白手起家!……”剧团当晚即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一些负责同志作了汇报演出。

《新中华报》发表了题为《民众剧团胜利完成了“小长征”深得民众欢迎》的文章,介绍了剧团四个月巡回演出的生动、成功情况。

6月中旬,民众剧团边演出边扩建。在延安未出发前,调来了张志华等3人;巡回演出中又吸收了李文宇、朱真等6人;演出结束回到延安后,又从青训班调来了侯唯动、黄俊耀、张克勤(张力)、党培英(女)、肖玲(女)等;从边区中学分配来米成义(米唏)、程士荣等;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派来牟尼(女)、林沐、萧肃;边区党委派来小孟;从马列学院调来了尚伯康;还从国统区来了王爱民等同志,剧团扩大到五六十人。

6月25日,柯仲平在《文艺突击》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介绍〈查路条〉兼论创造新的民族歌剧》的长篇论文,生动地阐述了老百姓观看《查路条》以及为什么爱看的原因。

7—9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延安除必要的演出外,着重学习、整顿和排练由马健翎创作并导演的秦腔现代戏《中国魂》、《三岔口》。

11月13日—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县徐家沟举行。民众剧团选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还为迎接大会的召开,赶排了马健翎创作的《干到底》一剧。

1940年(中华民国29年)

1月4日—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主席亲临大会作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柯仲平向大会汇报了民众剧团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大会选举毛泽东等97人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民众剧团柯仲平、马健翎亦当选为执行委员。

1月中旬,因国民党反动派包围边区,大搞磨擦,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为了用戏剧形式去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面目,决然赴边区的南大门—关中分区演出。在道佐铺演出时,团长柯仲平向第二战区(阎锡山所统治的山西)来边区的一批青年学生讲话,学生们听着听着感动得当场把国民

党的党徽从帽子上摘下来扔到火中烧掉。

在富县演出时，请来了眉户戏名艺人李卜来剧团工作。

3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到了关中分区的马家堡演出，和关中剧团相会，两个兄弟剧团临时在一起演出、工作和学习。

4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到淳化县城演出。在此驻防有三方面的军队：八路军一个营，西北军十七师一个营，陕西保安第六团。柯仲平团长在开演前，面对观众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大搞磨擦，假抗日、真反共的事实，致使气氛紧张。当晚演出《三岔口》等戏。戏演完我八路军和十七师立即派部队将剧团护送进入边区。

5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马庄（赤水县政府所在地）及其附近村镇演出时，县政府动员了该县两个完全小学的教师王振华和学生任国保、任应凯、王志岐、陈志祥、罗生华、张尚华、葛新民、韩玉魁、席文森、田永章等10余人参加了剧团。

7月，关中地区战争形势紧张，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接受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指示，离开关中分区进入陇东分区。在西华池演出时，音乐家马可、庄英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来民众剧团工作。

8月初，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到了陇东分区所在地——庆阳演出，收到了贺龙同志赠送的皮靴、钢盔、军刀、黄呢大衣等由抗日前线缴获的日军战利品，为剧团作演出用。

8月中、下旬，李卜来到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半年多时间，给全团同志教会了四五十个眉户常用曲调。这时排演了由尚伯康创作的第一个眉户现代戏《桃花村》，为用眉户剧种表现革命生活内容的新形式走出了第一步。接着又排演了马健翎创作和导演的第二个眉户现代戏《两亲家》。

9月中旬，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结束了在陇东分区的演出，离开庆阳，向三边分区所在地——定边进发。路经马岭镇时，群众知道民众剧团要路过此地，便冒着雨早早在街道两边房檐下等候，剧团来到后，非要看“演剧”不可。柯仲平、马健翎等领导商量后对大家说：我们是民众的剧团，只要民众愿看，我们就演……老乡们卸下自己头上的草帽，为伴奏员遮雨，剧团在雨中演，群众在雨中看，演了约三个小时。有些妇女观众自动地跑回家去做好各种家常饭，端到演出场地请剧团同志们吃。

9月底，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到达定边县城。因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剧团同志们生活极为困难，故趁定边举办骡马大会的机会，第

一次试验性售票演出，收到了很大的宣传效果，也解决了一些生活困难。

在极其繁忙的演出中，为了配合生产，克服困难，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封锁，在李卜的协助下，由马健翎创作和导演了眉户现代戏《十二把镰刀》。

10月，天寒地冻，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同志们还穿着破旧的单衣。柯仲平团长将他发表的长诗《边区自卫军》的稿费拿出来买羊毛，发动全团同志自己动手捻毛线，打毛衣，解决了冬衣问题。

为了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大搞磨擦，挑拨我党、我军和蒙古族人民的关系及其大汉族主义，民众剧团在定边排演了尚伯康创作的秦腔现代戏《八千马》。演出后受到蒙古、回、汉各族人民的极大欢迎。该剧在排练过程中，不少蒙古族同胞多次前来指点，介绍蒙古族的生活习俗，还把他们的衣物拿出来，让剧团演出使用。

11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离开定边返回延安途中，长途行军，加上又逢连绵不断的雨雪，很多同志跑烂了鞋，光着脚，流着血；男同志的眉毛、胡子，女同志的头发上都吊着冰坠子，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音乐家马可扛着民众剧团的团旗，不停地领着大家唱歌，激励剧团的同志，也鼓舞了沿途群众的抗日情绪。

12月中旬，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经过长达一年的跋涉和演出又回到了延安。上级领导部门极为关怀，早已为剧团在大砭沟后沟打好了几十孔新窑洞，并准备了一切生活用品，更加鼓舞了全团同志的战斗热情。

1941年（中华民国30年）

1—6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举行年会，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参加了大会，并报告了民众剧团巡回演出一年的工作情况。

民众剧团未外出，只在延安作些急需的演出，重点是学习、整顿和排戏。

1. 为了提高演职人员的文化、艺术素质，请来了刘白羽、杨超、柳青、舒强等人来剧团讲学。2. 调离了一些不适宜在剧团工作的人员。3. 清除了少数违犯党纪、政纪的人。4. 调进了部分领导干部，加强、健全了组织。5. 开始了小型农业生产，改善了伙食等。

为了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丑恶本质，上演了马健翎创作和导演的秦腔现代戏《抓破脸》。不但在政治上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在表演艺术的改进、提高方面亦取得了新的成就，在编剧方法和舞台美术上都

有了革新。如不再袭用传统戏曲中的上场引子、下场诗和自报家门的老套子；并从此取消了检场人，开始使用一些简单的软布景等。

7月，为纪念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建团三周年，试演了秦腔传统戏《打渔杀家》，演出效果良好，从此便开始了传统戏的排演。

9月，从联防司令部给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调来了第一位戏曲武功教练晋剧艺人胡万胜。

从延安马列学院调来王彭任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政治协理员。

调柯仲平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任命马健翎为民众剧团团长。

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首次发行有奖储蓄卷。为配合做好这一工作，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作为银行的社会服务团，先后赴甘泉、富县、绥德、米脂、清涧、子长等县及村镇演出，宣传并亲自推售奖券。还特意演出了马健翎创作的两个秦腔现代小戏《两块钱》和《近视眼张三》。这一工作从1941年秋持续至1942年春。

1942年（中华民国31年）

2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封锁，陕甘宁边区经济十分困难，民众剧团的日子也更为窘迫。经上级同意，从1942年春节开始公开售票演出戏曲传统戏，陆续排出了《大拜寿》、《伍员逃国》、《回荆州》等不少大、中、小型秦腔传统戏，赴甘泉、富县各村、镇的骡马大会和古庙会演出。

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工作者100多人的座谈会。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时，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会听取大家的发言。柯仲平在会上讲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演出盛况，说剧团每到一地当离开的时候，群众总是恋恋不舍地把剧团送得很远，并送给很多慰劳品。并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喜欢。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的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到会的许多人笑了，毛主席也笑了，并诙谐地说：“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6月—9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赴延安南部的甘泉、富县一带演出。一天，由富县的张村驿向寺前转点时，因中午下了一场大雨，人早到了寺前，而运送戏箱的牲口因河水大涨，半夜时分才赶到，这样便决定当晚不进行演出。哪料到了夜里12时许，群众提着灯笼，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要求